

# 唯物史观是改革创新与与时俱进的哲学基础

胡培兆

[摘要]唯物史观是实事求是探求、发展真理的世界观,其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改革创新与与时俱进的理论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就是要进入理论前沿阵地,以唯物史观研究好、把握住国情,占据理论制高点,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达到富国裕民之目的。要借鉴西方经济学,但断不可奉其为圭臬与主导。

[关键词]唯物史观;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哲学基础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6)03-0007-07

在我国改革开放历经37年取得巨大成就的2015年10月,来自五洲四海近400位中外学者聚集在北京大学召开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昭示了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张扬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神圣风采,有利于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笔者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一阐述。

## 一、唯物史观的形成与确定

19世纪4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中声望鹊起,追随者日增。两位伟人出于高度责任感,为了能有正确观点影响工人运动的发展,于1845—1846年间首先对德国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的终结性清算,在批判吸收古典哲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建立和阐述了他们自己的唯物史观,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书中说:“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

作者:胡培兆,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厦门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社科委经济学学部召集人。

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像的、所设想的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像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sup>[1](p.30)</sup>“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sup>[1](p.29)</sup>“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sup>[1](p.30)</sup>人的意识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sup>[1](p.30)</sup>这样一切都要从“地上”的物质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实际出发来看问题,而不是从“天上”的客观唯心论和自我的主观唯心论出发去思辨问题,从而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基础。其基本思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过简明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

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sup>[2](pp.32-33)</sup>

晚年的恩格斯发现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存在不够周全的缺憾,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谈及,因而又作了重要的校正性的补充说明。他说,当时针对论敌唯心史观的反对,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经济运动会给自己开辟道路,“是应当这样做的”,必要的,但事后发现“忽略”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因此给论敌钻了空子,被歪曲为经济的决定作用是绝对的、唯一的,别的都不起作用。同时也使“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因此,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给布洛赫的信中坦诚地说:“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sup>[3](p.462)</sup>“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sup>[3](p.462)</sup>这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sup>[3](p.462)</sup>表现为“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sup>[3](p.462)</sup>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给梅林的信中说,“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sup>[4](pp.94-95)</sup>有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

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sup>[4](p.94)</sup>1894年1月25日,恩格斯在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对唯物史观又作了辩证的全面阐述:“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sup>[4](p.199)</sup>继而补充说明上层建筑各因素对历史发展也有作用,“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sup>[3](p.461)</sup>“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无数个相互制约的个人意志会“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使“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sup>[3](p.462)</sup>“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sup>[4](p.199)</sup>至此,唯物史观就辩证地臻至完美。这个科学的辩证的唯物史观论述,就“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sup>[4](p.199)</sup>

诸如此类的这一切论述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前后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思熟虑才臻至完美的,是十分严谨、科学因而是完全正确的。它告诉我们立论必须有充分的客观依据,实事求是,既要尊重第一性的历史和现实,不能凭主观臆想,任意判断,同时又要辩证地重视其他非经济因素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们判断立论正误、辨别是非的客观准则。

唯物史观这条红线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全部著作的主线,同时也是我们正确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必须遵循的主线。因而尊重和贯彻唯物史观就是掌握和开掘马克思主义宝藏为人们谋福祉的金钥匙。

## 二、唯物史观的真理性

在唯物史观的视阈里,世界上的万物(包

括自然界、人类社会)都无例外、无时无刻地存在于具体的四维时空中不断运动着,于是就有永无止境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延伸与发展,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更迭变迁,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支配着。但人们因世界观不同,对此的认识却迥异。就真理而言,各人认识就大相径庭,如世界哲学史上的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真理就持客观唯心主义的见解,认为上帝就是真理,“就真理的最高意义而言,上帝即是真理,而且唯有上帝才是真理”。<sup>[5](p.37)</sup>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尼采却否认有真理,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真理,所以根本就没有真理。而马克思主义者相反,以唯物史观为真理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sup>[6](p.28)</sup>因此,真理是实践的反映,会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值得注意的是,对已失去时效的往昔真理都要尊重其历史价值和鉴今意义,只能扬弃而不是唾弃。真理发展与传承就像接力跑,一棒接一棒,否定历史也就是否定本源,否定自己。

真理具有二重性,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说它是绝对的,因为它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说它是相对的,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会发生变化,需要发展,要由新的结论即新的真理来取代。在行为上也要作相应的调整。这是唯物史观的真谛与科学性之所在。所以,马克思主义与本本教条主义和空空虚无主义是不相容的。这两种不良倾向都曾严重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与运用。同一个原理,有教条倾向者,往往持昨是今非的见解,过去有的是对的,说今天没有就错;而有虚无倾向者往往相反,持今是昨非的见解,现在没有的是对的,说过去有就错。在如此拉锯式的争论中不仅荒废精力、消磨时日,而且出现一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不免使人想起马克思对此种现象的讽刺性的严厉批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sup>[7](p.695)</sup>对那些冒牌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高论借用海涅的诗句“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予以回敬。<sup>[7](p.695)</sup>这足以引起理论界的反思。为说明问题,不妨复述笔者对《资本论》中几个原理的见解。

第一,劳动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最先是英国和法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布瓦歧尔培尔、斯密和李嘉图在研究商品交换均等性的奥秘中逐步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在吸收其合理内核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科学地论证了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价值。可在十多年前讨论深化劳动价值理论时冒出了不少违背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观点,甚至北京有家经济专业很强的大报有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竟把生产力要素“自然条件”等也当作价值的创造因子,名为“深化”,实则否定劳动价值理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的价值创造和财富创造是有严格区分的。价值是纯由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实体。这就是劳动”。它“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sup>[8](p.50)</sup>财富的创造就不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头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sup>[8](p.47)</sup>而作为财富的商品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sup>[8](p.48)</sup>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说:“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sup>[9](p.298)</sup>恩格斯也说:“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sup>[9](p.373)</sup>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价值是劳动单一因素创造的,而财富是由多种因素创造的。马克思鉴于当时工人工资普遍被压在劳动力价值之下过着痛苦不堪的悲惨生活,劳动力只能萎缩再生产,就专门研究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秘密。可在今天,事过境迁,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就需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论断全面、完整、统一地研究价值创造和财富创造。价值固然是抽象劳动创造的,但劳动要能创造价值,就必须同时创造使用价值,给价值提供载体。而使用价值的创造就不单靠劳动,还需要有资

本、土地等生产资料和技术与管理等社会的和自然的因素。这些因素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它们能使工人有用武之地,进行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以同时创造抽象财富和物质财富。否则,工人赤手空拳,是无法创造价值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这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对价值创造有不可替代的辅助作用,就必须允许它们参与价值分配。只要它们凭贡献各得其所,没有侵犯劳动权益,就不存在剥削问题。所以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必要的。这是深化认识劳动价值理论的必然结论。

第二,关于雇工8个就是资本家的问题。资本表现为货币,但不是任何数量的货币都可以转为资本,必须达到一个最低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仅可变资本而言,货币只有达到雇佣一定量工人的最低额才能转化为资本。假设工人一天劳动12小时,其中8小时是必要劳动,4小时是剩余劳动,资本家获取的剩余价值能使自己生活得比工人好一倍,并有一半剩余价值用来积累,那么货币所有者至少拥有能雇佣8个工人的货币额才能成为资本家。否则只能是“小业主”。<sup>[8](pp.341-342)</sup>这“假设”是按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设定的。不同的生产率有不同的雇工数。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工人一天12小时的劳动,10小时是必要劳动,2小时是剩余劳动,那么就不是8个,而是需要雇佣20个工人才能成为资本家。马克思明明说这是“假设”,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划成分时,这个雇工8个的假设竟成了“绝对”的实际标准,凡雇工8个以上的就划为资本家。结果将70万个小业主错划为“资本家”了。虽然后来都纠正了。可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鼓励回城知青办个体和私营企业,而当时的国家工商总局在具体审批时有个司长还说雇工不得超过7个,说这是《资本论》的论断,雇工8个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这是对《资本论》的严重歪曲!现在更不用说雇工几个的问题了,而是多多益善,欢迎尽可能多地为大众提供就业机会。

第三,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问题是本本主义者恪守不变的律条,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若不存在这个规律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而虚无主义者又走另一个极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根本没有说过有这个规律,因此有过冗长的争论。若按唯物史观来审视,这本不是问题。过去有不等于今天有,今天不存在不等于过去也不存在,一切按事实说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回答资本主义积累和发展将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会产生怎样影响的问题时,根据当时官方媒体和工厂视察员等公布的大量血泪事实为依据,否认了庸俗经济学家的关于工人生活得到改善的粉饰,以严密的逻辑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得出工人生活变得更加悲惨的结论。工人劳动不堪忍受,实际工作效率降低,吃住更差,环境污秽,瘟疫肆虐,疾病丛生,城市富有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富人阶级比工人阶级有两倍的生命权。因为工人生活条件恶劣,于是作为主要兵源的工人身材变矮小,征兵要求的身高标准降低。虽然《资本论》中没有出现“绝对贫困化”的字眼,却有绝对贫困化规律的论断:“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相应并存。“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sup>[8](p.708)</sup>这种情况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西欧、北欧还依然存在吗?彼一时此一时,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只有领会贯穿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唯物史观这条红线,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任何问题而不会误解误用。马克思主义的公信力和生命力任何时候都靠实事求是。为此,我们对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也要实事求是,恪守他们的教导:“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sup>[8](p.26)</sup>令人遗憾的是,有些振振有词的马克思学说的

研究者并非都是如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马克思学派”。

### 三、唯物史观要求不断改革创新 与时俱进

唯物史观是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崇尚理在事中,从客观现实中探蕴索真,作出科学结论。它所揭示的人的意识与社会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认识论是实践论,社会科学是历史科学,须臾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这个大背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所以,当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科学发达了,人的观念也要跟着变,与时俱进。作为现实反映论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原理也要不断发展和升华,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教条化。马克思说得好:“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8](p.24)</sup>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思想是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促进社会不断发展,消除不平等的弊病,增进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人类的福祉。这种信仰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是凭主观意志随心所欲。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sup>[2](p.33)</sup>这个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规律就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个主题不断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为主线的各种经济关系,

协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运行模式转型为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等的改革发展过程都离不开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规律的认识与运用,符合唯物史观的要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sup>[10](p.22)</sup>也因为我们把社会主义置于中国国情的现实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行驶在快车道上,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是十分全面深刻精准的。党的十五大报告说:“实事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sup>[6](p.382)</sup>实事求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朴实、最简要、最本质的概括和表述。邓小平提出按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6](p.373)</sup>这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具体应用和发展的光辉典范。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以大智慧革旧布新的大革命。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持续不断地激浊扬清、推陈出新。改革开放是无止境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sup>[11]</sup>在这路漫漫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坚持唯物史观不断研究、深化认识,同心同德予以解决。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进行的。先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再到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再逐步扩展到全面改革。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最先应运而生成热门学科,获得空前发展。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产权、股份制、市场经济、有效供给、城市化等

理论方面有创新贡献。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研究却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冲击。经济学界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逐渐滋长了西化倾向,且愈演愈烈,乃至在相当程度和相当范围内占据主流地位。对此,20世纪20年代回国的经济学博士陈岱孙生前就著文抨击,“我国经济学界,这些年来又渐渐滋长了一种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的倾向,值得警惕的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抄照搬的倾向变得空前严重起来,如果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认真加以克服,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并敬告“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sup>[12]</sup>可言之凿凿,听之藐藐,令人遗憾。这是特别值得经济学界深思的问题。

自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凭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以后,西方文化就日益舶入中国。此后就有旧学与新学关系如何定位之歧议。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主张。1921年,梁启超将其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快流布全国,成为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标帜,至今仍是我们的社会科学应当遵循的准绳。对西方经济学必须借鉴,但断不可奉其为圭臬与主导。1940年,毛泽东对全盘西化就有过批评,他说:“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国情是吃过大亏的。”<sup>[13](p.398)</sup>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就说:“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sup>[6](p.256)</sup>提出按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他的一大历史贡献。习近平也再三强调:“我们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既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也不能罔顾国情、东施效颦。我们要坚定不移走好走稳自己的路。”<sup>[14]</sup>“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否则的话不仅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这个道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

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乎?水土不服。’”<sup>[12]</sup>我们党几代领导人的教导是唯物史观的真理,当记取而行之。

联系到我国经济学界目前状况,有两种倾向严重妨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一种倾向是追随画蛇添足般的数学化。强求经济学著述必须有所谓定量分析的数学模型和方程,否则杂志不予发表,学位论文不予通过。于是为数学而数学,不论是否必要,都要装模作样地用数学模型方程来装潢包装,实际只是套用软件,改换一下数据而已,作者不懂,编辑不懂,完全是“皇帝新衣”。另一种倾向是脱离社会的实际经济问题,违背经济学研究的宗旨。所以现在期刊发表的大量经济学论文形式繁杂、思想空乏,令人不堪卒读。

关于经济学数学化的问题,老一辈经济学家早有告诫。王亚南在20世纪40年代批判旧中国奥地利学派的纯粹经济理论时就指出:为了补充他们经济学常识化的缺点,“他们有意无意地把他们的理论与数学结合起来,借数学的一般性与不可动摇的科学性,使自己七颠八倒的经济学说,得到有力地支持”,“数学方法,原是可以应用而且应当应用的,但它被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却有一个限度。对于已经由其他方法论证出的经济运动法则,再借数字或数理的分析,予以更明确的说明,那是被容许的。但如一开始就诉诸于数学的诸般概念,并把一切的经济命题,分别拘束在一些解释方程式中,其结果,便是以经济现象去迁就数学方式,而非以数学方式来解释经济现象”,这种“经济学之观念形而上学化,不能解释实际经济问题”。<sup>[15](pp.162-163)</sup>半个多世纪以后,陈岱孙对数学方法也同样不予认同。他说:“战后西方经济学一个十分注目的现象是广泛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不少当代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满篇满纸都是数学公式。此外,当代西方经济学在方法论上还继承其前人特别是李嘉图学说解体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固有手法,即以描述经济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为能事,不能、不愿也不敢触及经济问题本质。”<sup>[12]</sup>这样纯数学的经济学虽然风靡

论坛,却根本进不了社会。社会科学进不了社会,等于零。这是西化经济学的堕落与悲哀。

经济理论的创新性研究、特别是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书本出发,深入探究其根源及其解决办法。如当前对供给侧的研究。在供需关系问题上,西方主流经济学重需求轻供给,甚至像美国主流学派就蔑视供给学派理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只有需求学派而没有供给学派的词条。客观地讲,这完全是偏见。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盛势昌达一个半多世纪的供给学派理论就几乎遭封杀了。直到40多年后,现代供给学派理论在美国因资本主义经济的滞涨才得以复苏。“里根经济学”的美名实际就是现代供给学派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虽然也批判过萨伊供给观的错误方面,说“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sup>[8](p.132)</sup>但批判的是萨伊以此否认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在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辩证统一中,生产与供给是起点。“生产生产着消费”、“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sup>[2](pp.10-12)</sup>所以,当前面对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状况,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有效供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中外的人文社会科学,无例外均属意识形态的软科学,国际间的渗透与反渗透竞争日趋激烈,虽然有互相兼容与借鉴的一面,但必须坚守意识形态的国情特性,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确保文化改革发展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特别是一些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衰微,精神缺钙,甚至有的高校的经济学院竟出现政治经济学博士点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只能作选修课开的咄咄怪事,西方经济学堂而皇之地占据主流地位。高校是我国意识形态教育最重要的领域,必须重视。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施意见》明确强调学校党委在领导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中要“牢牢掌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邓小平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sup>[6](p.380)</sup>既有规定,就靠党委了。党委就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强有力抓好、做好,特别是抓好人事安排与课程设置,同时要实行问责制。

####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5][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11]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讲演[N].人民日报,2014-04-01.
- [12]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J].经济动态,1995,(11).
- [13]毛泽东著作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4]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1-01.
- [15]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王亚南经济思想史论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涵林

**Ignoring No Rules of the Proportional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Socialized mass production calls for the proportional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Such development is a materialistic rule under certain socialist conditions, the violation of which leads to its punishment. The development in proportion is made possible by the fundamental socialist economic institu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in which dominating public ownership and other accompanied ownership coexist. The major proportional relations in national economy include sector relationship,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e, light and heavy industry, the internal proportion within sectors, the proportion of first, second and tertiary industry, the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that betwee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y. The proportional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requires "a better role of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 governmental macroeconomic control, the proportional development calls for building up and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aking scientific industrial policies, forecasting structural flux of industries and changes in supply and demand, and persisting in and optimizing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institutions.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proportion stands for planning, whil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ers to planned market economy. (Li Cheng-xun)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 Philosophical Basis for Reform, Innovation and Keeping Updated with Tim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a practical world view for truth seeking, and the rule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cover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r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form, innovation and keeping up with times. Construct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ails a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s to enter theoretical frontiers, study and master national realities by the mea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ak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economy,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affluence of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Although we should draw on Western economical theories, we shall never grant them with dominating significance. (Hu Pei-zhao)

**The Essence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Four Supplementary Theoretical Formulations:** Socialistic essentialism is the logical origi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underlines the latt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Summing up historical experiences, Deng Xiaoping scientifically generalized the essenc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in a scientific way in reply to a major proposition of "What is socialism". CPC enriched Deng's definit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further put forward five concepts of the new normal development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larifying the issue of development for whom and by whom with a deeper interpretation of "propelling shared development". That is to say, socialistic essentialism is the soul for contemporary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st. (Yang Cheng-xun)

**Three Dual Mechanisms fo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ir Particularity: An Instrumental Exploration on the Compatible Co-Existence of Public Ownership, Commodities and Market:** The kernel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rests more on the intrinsic integration of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especially the ownership by the whole people, with market economy than the external combination of socialist superstructure and market-economy basis. It refers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to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In 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ies, public ownership and market economy are deemed as two parallels with no intersection. In comparison, the compatibility of market economy with public ownership is a marked innovation in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ies. Hence, socialist commodity economy is naturally connected with public ownership, namely a particular development stage of commodity economy. Its peculiarity is demonstra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multiple economic structure featured by public ownership, intrinsic changes of commodity as the ele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running of dual mechanism with diverse compositions. (Yuan En-zhen)

**The Tide of Sharing: On the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Socialist Values and Principles in an Internet-of-Things Age:**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proposed in the 5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proposition that sharing is an essential requisite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built on the basis of Marxism classical theories and come in line with global advancement. It is one major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to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ories by contemporary CPC members represent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carrying landmark weight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campaigns. Transcending current de-ideological tendency in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and judg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Internet-of-things surge at present has given birth to a tide of sharing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highly socialized production mode and sharing values, indicating the accelerated demise of capitalism and great revitalization of socialism. China in adherence to sharing development is bound to lead the tide of times and make new and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tudy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sharing values could prop up shared development and shore up self-confidence in the pathway, institutions and valu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Fang-xi)

**The Internet and Leaders' Governance in Various Localities and Divisions: A New Platform for Training Outstanding Cadres:** With widesprea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ecological culture, CPC and etc,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new platform for training outstanding cadr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Firstly, the advance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ps up the upgrading of administration method and capability. Secondly, the mastery of the internet could testify cadres' faculty, reflecting their personalities and working styles. Therefore, the Internet and leaders' governance in various localities and divisions should become one of the standards for measuring outstanding cadr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example of Internet governance by Chen Xingjia, the Party Secretary of Badong County in Hubei Province, has demonstrated an outstanding CPC cadre's character pursuit and anti-corruption conviction. (Feng Bo)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al Industries, Cultural Rights and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With a Concurrent Commentary on Cultural Governance:** Cultural industries with marked political nature, are crucial parts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s embedded in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development, cultural rights,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cultural governance. On the one hand, cultural industries, as a crucial approach to the demonstration of civilian cultural rights,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general cultural benefits, provide increasingly abundant cultural products and servi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positional natur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determines the necessity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cern of civilian cultural rights, establishing the philosophical linkage between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hat is to say, cultural governance should not only be aimed at obtaining mass' cultural benefits and at accommodating the